

# 甲午战争前先进 知识分子救国道路的探索

刘国军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历史。与此同时,中国人民也开始了寻求真理、寻找救国道路的艰辛曲折历程。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的半个世纪里,伴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西学东渐规模的逐步扩大,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历史主题,中国涌现出一大批探索救国道路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他们中间,有舞文弄墨的文人学者,有投资近代工商业、惨淡经营的民族资本家,有饱读诗书、通过科举正途而跻身于朝士行列的政府官员、驻外使节,也有厕身于洋务活动、为洋务大员出谋划策的幕僚。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同,生活经历迥异,但是在国家贫弱、外敌入侵、民族面临危亡的时刻,他们从爱国主义出发,渐次提出了一系列救国方案,在探索救国的道路上,留下了可贵的足迹。

第一次鸦片战争败北,使中华民族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耻辱。“中国向何处去”由此成为贯通整个近代的迫切的主题。虽然在鸦片战争中中国惨遭失败,被迫订立城下之盟,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然而以道光皇帝为首的清王朝统治集团上层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省致败之因,其颟顸无知,虚骄自大,依然如故。但是,鸦片战争的炮火毕竟使“天朝帝国”“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sup>①</sup>,这在客观上为西方思想文化的输入扫清了政治障碍。更重要的是,赔款割地的奇耻大辱深深刺痛了一大批中国传统文化哺育出来的士大夫,强烈的忧患意识促使他们认真思考西方侵略及优越文明构成外压所带来的中国出路问题,而林则徐、魏源、徐继畲、梁廷枏等人则成为这些爱国知识分子中的首批杰出代表。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了严格的闭关政策,不仅造成了广大下层群众对外界的无知,而且也使统治阶级本身自食恶果,以致出现了“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的局面。然而,中国毕竟在正义之战中被打败,这个冷酷无情的事实使正视现实的爱国士大夫们认识到:要想战胜碧眼隆准白皮肤的陌生对手,必须得首先了解它;要想弄清中国失利的原因,必须对拥有坚船利炮的侵略者所在的那个社会进行一番全面的考察。按照这个逻辑,在鸦片战争期间及其后,林则徐、魏源等人先后编译了《四洲志》、《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海国四说》等关于外部世界的书籍。它们的问

世,既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爱国主义思想和开放意识的具体表现,也成为古老中华民族初步觉醒的标志。通过努力探索,这些先进知识分子了解到了各国的地理、历史、物产、习惯和风土人情,而且也了解到了层次较深的经济和政治情况。其中,欧美诸国是他们关心的重点。这些国家精湛发达的科学技艺、以商立国的繁荣经济,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于西方资产阶级竭力标榜的资本主义民主,他们不仅注意了解,而且还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例如梁廷枏说:“余观于米利坚之合众为国,行之久而不变,然后知古者可畏非民之未为虚语也。彼自立国以来,凡一国之赏罚禁令,咸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以守之。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统领限年而易,殆如中国之吏,虽有善者,未尝以人变法,既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sup>②</sup>对于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魏源更是盛赞其既“公”且“周”：“公举一大酋总摄之,非惟不及世,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sup>③</sup>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不仅将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瑞士称为“国无苛政,风俗俭朴淳良,百年不见兵革”的“西土之桃花源”<sup>④</sup>,而且将美国民主制度的主要创始人华盛顿尊为“泰西古今人物”之首,并称赞其“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sup>⑤</sup>。

国门洞开,向外探求,使这些爱国的知识分子在比较中不仅看到了中西文明的明显差异,而且也看到了彼此差距。一向被中国视为夷狄的西方也有强于华夏之处,这一现实使爱国的知识分子们很自然地产生了向西方学习以抵制侵略的思想,魏源将这一思想概括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然而,由于时代、阶级和认识的局限,他们既没有提出中国应当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建议,也没有提出符合中国近代国情、切实可行的政治主张。在他们看来,所谓“夷之长技”不过是林则徐所说的坚船利炮,不过是魏源所说的战船、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这些才是值得中国虚心学习、认真研究的。这种在军事上学习西方以救国的见解显然缺乏深度,然而,作为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提出的第一个救国方案,却意义重大。它的提出,不仅在思想上冲击了中华民族觉醒的心理障碍——“华夷之辨”,而且也为后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索救国道路指明了大方向——“师夷”。沿着这个方向,生活于江南地区的爱国知识分子冯桂芬又将近代爱国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

正当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弥漫京城之时,《北京条约》等一批新的不平等条约签订之际,拥有丰富西学知识、痛感“夷患不已”的冯桂芬怀着强烈的民族耻辱感和危机感,写下了他的忧时之作《校邠庐抗议》。在这本书中,他通过对西强中弱、西富中贫原因的认真分析,得出了五不如“夷”的结论,除了林则徐、魏源等人所说的“船坚炮利不如夷”之外,中国还有四不如“夷”,就是“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sup>⑥</sup>。这就是说,中国不仅在军事方面不如西方,就是在教育、经济、政治等方面,也与西方国家存在着差距。那么,怎样才能改变中国“不如夷”的状况呢?冯桂芬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向西方学习,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并且将二者结合起来。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从这些措施的实际内容来看,其向西方学习的范围明显扩大了。当时,冯桂芬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而且也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艺,还主张仿效西方,采用机器进行农业耕作,开采地下矿产资源,藏富于民。至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冯桂芬通过阅读西书已对它有很深的了解,并通过比较,看到了它比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有优越

之处。他曾说“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但在封建观念构成的氛围仍十分浓重的情况下，对延续了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提出异议，职卑位微的冯桂芬不能不有所顾忌，这从下面的史实中已反映出来：《校邠庐抗议》手稿本中，在《公黜陟议》篇的末段，有这样一段话：“及见诸夷书，米利坚以总统领治国，传贤不传子，由百姓各以所推姓名投柜中，视所推最多者立之，其余小统领皆然。国以富强，其势嘒嘒凌俄、英、法之上，谁谓夷狄无人哉！”在写上这段话之后，冯桂芬又将它全部删去，以免招惹麻烦，并另加浮签批注：“末行似不足为典”，并将“传贤不传子”一语的“贤”与“子”字，涂抹得难以辨认<sup>⑦</sup>。其矛盾心态显而易见。冯桂芬虽然没敢明确提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主张，但他却在为改变“君民隔阂”而提出的“公黜陟”、“复乡职”、“复陈诗”等措施中，将民主的精神注入其中。例如，在“公黜陟”措施中，他把对官吏考核的优劣，同“乡人”即百姓的意见联系起来；将官吏的升降，同百姓的“公论”联系起来；在“复乡职”措施中，他设计了一套选举程序：由百姓选举有一定任期的乡官，乡官没有“缉捕”、“征收”、“断狱”的权力，但却有推选低级官吏的权力；在“复陈诗”措施中，他主张让“郡县举贡生监平日有学有行者”，以竹枝词一类的通俗诗歌上呈朝廷和皇上，反映社会和自己的苦情，表达自己的政见，对于陈诗者，朝廷有赏无罚，言者无罪。从这些措施中，不难看出冯桂芬表达了十分微弱的以民主、自由为基本内容的民权思想。

总之，先进知识分子冯桂芬在60年代初将中国人民关于救国道路的探索又推向了一个新的台阶。审视他所提出的救国方案，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显著特点，即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和改革内政的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不仅使学习西方的范围扩大到了科学、技艺，而且也触及了经济、政治等社会层面，从而表达了朦胧微弱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呼声。这种进步的爱国思想，不仅启迪了70年代探索救国道路的先进知识分子，而且也影响了一批80、90年代中国进步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但是，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他们提倡发展资本主义的想法是行不通的。

## 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西方廉价商品如潮水般涌入，造成了中国社会经济日益衰败，人们生活更加贫困。7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边疆危机，使中外民族矛盾日趋尖锐。进入“求富”阶段的洋务运动，其弊端开始明显暴露出来。与此同时，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中国民族资本所经营的近代企业也开始创办，中外文化交流的规模和速度也有了显著扩大。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中国知识界的进一步分化。以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继续探索救国真理，提出了一系列救国主张，表达了更加明确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意向，站在同代人的前列。

与19世纪40、50年代爱国知识分子相比，70年代的王韬等爱国知识分子们开眼看世界的幅度更为广大。除了以西书为媒介了解世界以外，他们当中的某些人还与来华的洋学士朝夕过从，切磋知识。也有些人则亲历西方，足践欧土。因此，对于大千世界的了解，他们远远超过了40、50年代的先进知识分子，对于世界大势和中国所面临的危境的认识，也非60年代初的冯桂芬所能匹敌。当时，他们普遍认为，当今的时代是弱肉强食的时代，贫弱的中国正处于强敌的环伺之中。中国要想摆脱危境，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平等地位，必须尽快富强起来。正如王韬所说：“所谓万国公法者，必先兵强国富，势盛力敌，而后

可入乎此,否则束缚弛骤,亦惟其所欲为而已。”<sup>⑧</sup>他们也一致感到,中国要转弱为强,只有求变,这是形势所迫:“诸国既持其长,自远而至,挟其所有以傲我之所无,日从而张其炫耀,肆其欺凌,相轧相倾,则我又乌能不思变计哉!”<sup>⑨</sup>“设我中国至此时而不一变,安能埒于欧洲诸大国,而与之比权量力也哉!”<sup>⑩</sup>。为此,他们从多方面批评了墨守成规、食古不化的封建顽固派。对于只限于学习西方军事装备和科学技艺的洋务求“变”措施,他们也大加抨击。他们认为,中国要想富强,必须改革“积数百年末流之弊”<sup>⑪</sup>的弊法,同时,必须向西方学习。但是,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方文明面前,什么是中国应当学习的关键呢?经过认真分析,他们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发展工商是西方富强的关键所在,因而也是中国应当取法的当务之急。当时,他们的共同思路是,富强是救国的根本,而求富又是求强的前提。王韬说:“先富而后强”<sup>⑫</sup>,马建忠则言:“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sup>⑬</sup>那么,如何才能致富呢?对于这个问题,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爱国知识分子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王韬认为,兴利是求富的关键。他说:“中国地大物博,于地球四大洲中最为富强,特当轴者不能自握其利权,自浚其利藪,而亟为之兴利焉耳!”<sup>⑭</sup>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提出了采用西方雇佣劳动和公司组织以经营工矿交通企业的主张:“开掘煤铁五金诸矿,皆许民间自立公司,视其所出繁旺与否,计分征抽,而不使官吏得掣其肘。”<sup>⑮</sup>“制造机器,兴筑铁路,建置大小轮船,其利皆公之于民,要令富民出其资,贫民殫其力,利益溥沾,贤愚同奋。”<sup>⑯</sup>他充满信心地说:“诸利既兴,而中国不富强者,未之有也。”<sup>⑰</sup>

薛福成则提出了“夺外力以润吾民”的主张。他认为,当今的世界是“各国竞事通商”的世界。西方各国之所以富强,就在于首先有了发达的工商业,“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sup>⑱</sup>既然中国不能禁止与各国通商,那么,“惟有自理商务而已”<sup>⑲</sup>,即效仿西方,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他说:“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则外洋少获一分之利,而吾民得自食一分之利,夺外利以润吾民,无俞于此。”<sup>⑳</sup>可见,他强调发展工商业,与外人争利,其最终目的,是“润吾民”,即“富吾民”。在他看来,“富吾民”是国家富强的关键。他指出,中国在与外国通商时,只要能够做到“彼此可共获之利,则从而分之,中国所自有之利,则从而扩之,外洋所独擅之利,则从而夺之”<sup>㉑</sup>,那么,“中国之富可期,而后诸务可次第修兴,如是犹受制于邻敌者,未之有也。”<sup>㉒</sup>

至于马建忠,则提出了著名的“富民”说。他的基本思路是:“转贫民为富民,民富而国自强。”<sup>㉓</sup>很明显,他和薛福成一样,将“富民”看成是国强的基础。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马建忠又认为,通商是求富的关键。他说,英、美、法、俄、德等国家“无不以通商致富。尝居其邦而考其求富之源,一以通商为准。通商而出口货溢于进口者利,通商而出口货等于进口者亦利,通商而进口货溢于出口者不利。”<sup>㉔</sup>据此,他提出了采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提高中国丝茶的质量和数量,扩大销路,减轻丝茶税厘;仿效西方,设立“商务衙门”;采取关税保护措施,修改不平等条约中的商约等一系列具体主张。总之,这批先进知识分子们用不尽相同的语言表达了相同的救国见解: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这种主张将60年代初冯桂芬朦胧而含糊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完全明朗化了。它的出现,标志着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关于救国道路的探索又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需要指出的是,王韬等先进知识分子在70年代也了解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院制度,并且有些人还发表了一些赞美之词,但是,他们并没有将它视为西方富强的根本,而是中国富强的关键。在他们看来,西方议院制度的弊端远远多于它的优点。所以,主张

在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是这个阶段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基本特点,也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在探索救国道路上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 三

19世纪80年代以后,从原来的商人、地主和官僚向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转化的现象,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反映新兴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要求的“君主立宪”的呼声,渐次高涨,这是中国社会内部阶级关系变动下所产生的新的时代思潮。这时,早已出现的边疆危机,逐渐形成了明显的民族压迫形势。80年代初的中法战争,90年代初的中日之战,既暴露了清政府的政治腐败,也暴露出洋务活动的种种弊端。这些社会因素极大地刺激了爱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敏感性。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使他们更加迫切地要求改变现状。在艰苦探索的基础上,爱国的知识分子们将救国思想又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由70年代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跨入80年代进而提出君主立宪的政治要求。在这些人中,郑观应、陈炽、崔国因、张树声、康有为等人是其代表。

当时,先进知识分子们在寻找西方强盛、中国贫弱的缘由时,开始将目光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而并不陌生的西方政治制度则首先成为他们关注和研究的主要对象。经过比较和分析,他们普遍感到,西方的议院制度的确有种种优点,而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使国家富强。因此,中国要想转弱为强、转贫为富,必须首先在这方面取法泰西,进行改革。例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指出,实行议院有许多好处,除了可以根绝专制、澄清吏治以外,还可以使国家富强,抵御外侮。他说:“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每有举错,询谋金同。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朝野上下,同心同德,此所以交际邻封,有我薄人,无人薄我。人第见其士马之强壮,炮船之坚利,器用之新奇,用以雄视宇内,不知其折冲御侮,合众志以成城,制治固有本也。”<sup>⑧</sup>他还说:“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sup>⑨</sup>他又说:“余尝阅万国史鉴,考究各国得失盛衰,而深思其故。盖五大洲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sup>⑩</sup>显然,他所主张建立的是“权得其平”的“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政体。而这种主张也是当时多数爱国知识分子的共识。例如,爱国知识分子陈炽将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和“君民共主之国”三类。他认为,前两类国家均有弊端,只有君民共主最好。他说:“所谓君主者,有上议院无下议院,军国大事,概掌于官,而民不得预闻焉者也。所谓民主者,有下议院而无上议院,朝章国故,乃岁需之款,概决于民,而君亦几同守府者也。”“惟君民共主之国,有上议院,国家爵命之官也;有下议院,绅民公举之员也。院之或开或散有定期,事之或行或止有定论,人之或贤或否有定评,国用有例支,有公积,例支以给岁费,公积以备不虞,必君民上下询谋金同,始能动用,公积不足,则各出私财以佐之,此所以举无废言,行无废事,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一心一德,合众志以成城也。”<sup>⑪</sup>可见,陈炽把能否设立君主立宪的议院看成是国家兴亡的关键。他还认为,中国要想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开设议院是最好的办法:“今日万国通商,要求无厌,既立议院,即可以民情不顺,力拒坚持,合亿万人为一心,莫善于此。”<sup>⑫</sup>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先进知识分子们不仅著书立说,倡言立宪,坐而论道,而且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还将思想付诸行动。中法战争前后,崔国因、郑观应、张树声和康有为等人纷纷

上书清廷,要求清政府实行立宪,以救危局。最先上书清廷的是翰林院官员崔国因,并非过去人们所认为的郑观应。在1883年,即中法战争爆发的这一年,崔国因上了《奏为国体不定后患方深请鉴前车速筹布置恭折》。正是在这份奏折中,崔国因明确地向清政府提出了开设议院的要求。在奏折中,崔国因首先陈述了中国边疆危机的严重形势,然后提出了10项自强之道,其中第9项便是“开议院”。崔国因认为,设立议院,除了可以沟通上下之情外,还可以使百姓了解真情,为国分忧,解决兵源和饷源问题,从而更有效地抵御外侮。他说:“且今日之事势,为古今之创局,凡所议论,每骇听闻。而练兵、筹饷各举为向未经见者,必斯民身居局中,悉其原委,知此中之实有不得不然者,乃肯设身处地,为朝廷分忧,而后兵可增不以为抽丁,饷可增不以为重敛,凡有设施,坦然明白,所当行者,乃可次第行也。”<sup>②</sup>为了防止议院形同虚设,真正做到沟通上下之情,他又提出了议员的任期年限:“是限以三年,使上议院无权重之弊,而下议院之新举自民间者,于民事知之悉也。”崔国因认为,在这10项自强之道中,“设议院”是关键的一项:“议院设而后人才辈出,增饷增兵之制可以次第举行也”,“设议院者,所以因势利导,而为自强之关键也。”<sup>③</sup>继崔国因之后,1884年6月,正当中法交战之际,郑观应也“上书政府,请开国会”,清政府“以狂妄之言”<sup>④</sup>予以拒绝。同年10月26日,正任职两广总督的洋务大员张树声在病危之际伏枕口授了一份奏折,即他著名的《遗折》,也向清廷提出了开设议院的要求。与崔国因一样,张树声在《遗折》中也首先陈述了一番中国的危险形势。随后,他又大胆地批评了当道者的失策。接着,便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开设议院的主张:“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软?”<sup>⑤</sup>最后,他希望皇上能“通筹全局,取琴瑟不调甚者而改弦更张之。”“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sup>⑥</sup>

中法战争后的第三年,30岁的无名秀才康有为来到北京,写了《上清帝第一书》。在这份五千言的上书中,他向清廷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项建议,以挽救中国面临的危局。在阐述“通下情”主张时,康有为指出,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君主专制,使民情不能上达。为了使下情能够上达,他建议清廷“增设训议之官,召置天下耆贤,以抒下情”,这样“皇太后、皇上高坐法宫之中,远洞万里之外,何奸不照,何法不立哉。”<sup>⑦</sup>不难看出,康有为设计的“训议之官”既来自民间,又有向朝廷提出建议、发表言论的权力。显然,康有为所表达的思想与郑观应、崔国因、陈炽、张树声等人所表达的君主立宪主张在本质上并无二致。耐人寻味的是,在上书的这几个人之中,竟有为清廷效力的政府官员、封疆大吏。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将康有为看成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视郑观应为著名的早期维新人物,而将崔国因等人排斥在先进知识分子的行列之外,斥之为反动的洋务官僚,即或有所肯定,至多只是地主阶级中的开明派。笔者认为类似评价有欠公允。众所周知,贫弱的中国是被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用武力逼上半殖民地道路的。因此,完成民族独立,实现国家的富强和繁荣便成为近代历史赋予中国人民的时代使命,也成为近代中国一切改革的核心内容。中国要实现独立和富强,就必须改变腐败的政治制度,就必须向优越于中国的西方学习。这正如毛泽东所说:“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sup>⑧</sup>为救国而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洋枪水雷;为救国而学习西方的经济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为救国而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这是近代爱国思想发展的必然轨迹。近代史上,任何一位关心民族命运、国家前途、正视现实、开眼看世界的有识

之士,都能够沿着这条思想轨迹前进。崔国因、张树声等人正是这样的爱国士大夫。因此,他们能够和康有为、郑观应等下层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形成共识,在行动上达到同步。总之,正是这些爱国知识分子的努力探索,才将近代爱国思想逐步地推上了一个又一个的新阶段,最终出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及其巅峰——君主立宪,从而为 90 年代维新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基础和行动榜样。马关签约的消息刚传到北京,成千的旧式举人便“跪着造反了”。

-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 页。  
② 《清史列传》第 72 卷引梁廷枏《合省图说自序》。  
③ 《海国图志》,第 59 卷。  
④ 《瀛环志略》,第 5 卷。  
⑤ 《瀛环志略》第 9 卷。  
⑥ 《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  
⑦ 《校邠庐抗议·公黜陟议》,转引自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  
⑧ 《强园文录外编·变法自强上》。  
⑨ 《强园文录外编·变法上》。  
⑩ 《强园文录外编·变法中》。  
⑪ 《薛福成选集》,《筹洋刍议·变法》。  
⑫ 《强园文录外编》,第 116 页。  
⑬⑭⑮ 《适可斋纪言纪行》,第 1 卷。  
⑯⑰ 《强园文录外编·兴利》。  
⑱⑲ 《强园文录外编》,第 22 页。  
⑳㉑㉒㉓ 《薛福成全集》,《筹洋刍议·商政》。  
㉔㉕㉖ 《盛世危言·议院》。  
㉗㉘ 《庸书·议院》。  
㉙㉚ 《集贤子存稿》,第 22 页、第 23 页,转引自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  
㉛ 《盛世危言后编》,第 3 卷。  
㉜㉝ 《张靖达公奏议·遗折》。  
㉞ 《戊戌变法》,第 2 册,第 130 页。  
㉟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 4 卷。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 张晓校)

(上接第 84 页)

起了重要作用,一直到封建社会中期,这种理论无大变化。到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封建统治的日益衰落,国家的教化职能与镇压职能均待加强,汉代儒者所建立的正统法理论与变化了的政治局面又出现了不适应的情况,而且由于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带有浓厚神学色彩的封建正统法理论日益暴露出自身理论的粗糙。于是又有了带有思

辨哲学色彩的理学国家观和理学法律观,并重提“重刑制民”的法律观念,以适应新的政治需要。

总之,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在政治导向下不断发展变化,法理论,法规范成为专制君主的奴仆,这种现象,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始终。

- 
- ①② 西塞罗《法律篇》。  
③ 《庄子·齐物论》。  
④ 《商君书·开塞》。  
⑤⑥⑦⑧ 《左传》“昭公二十年”、“昭公二十九年”、“昭公元年”、“庄公十八年”。  
⑨⑩⑪⑫ 《韩非子》,“二柄”、“八经”、“六反”、“外储说右下”。  
⑬ 《神学政治论》。  
⑭⑮ 《论语·宪问》。  
⑯⑰ 《礼记》,“荣辱篇”、“王制篇”。  
⑱ 《史记·秦本纪》。  
⑲ 《九朝律考·汉律考》。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法律系)

(责任编辑 张晓校)